

北京隆福寺 商业民俗志

皇家寺庙，不仅庄严肃穆，
它的商业民俗也趣味十足。

卫才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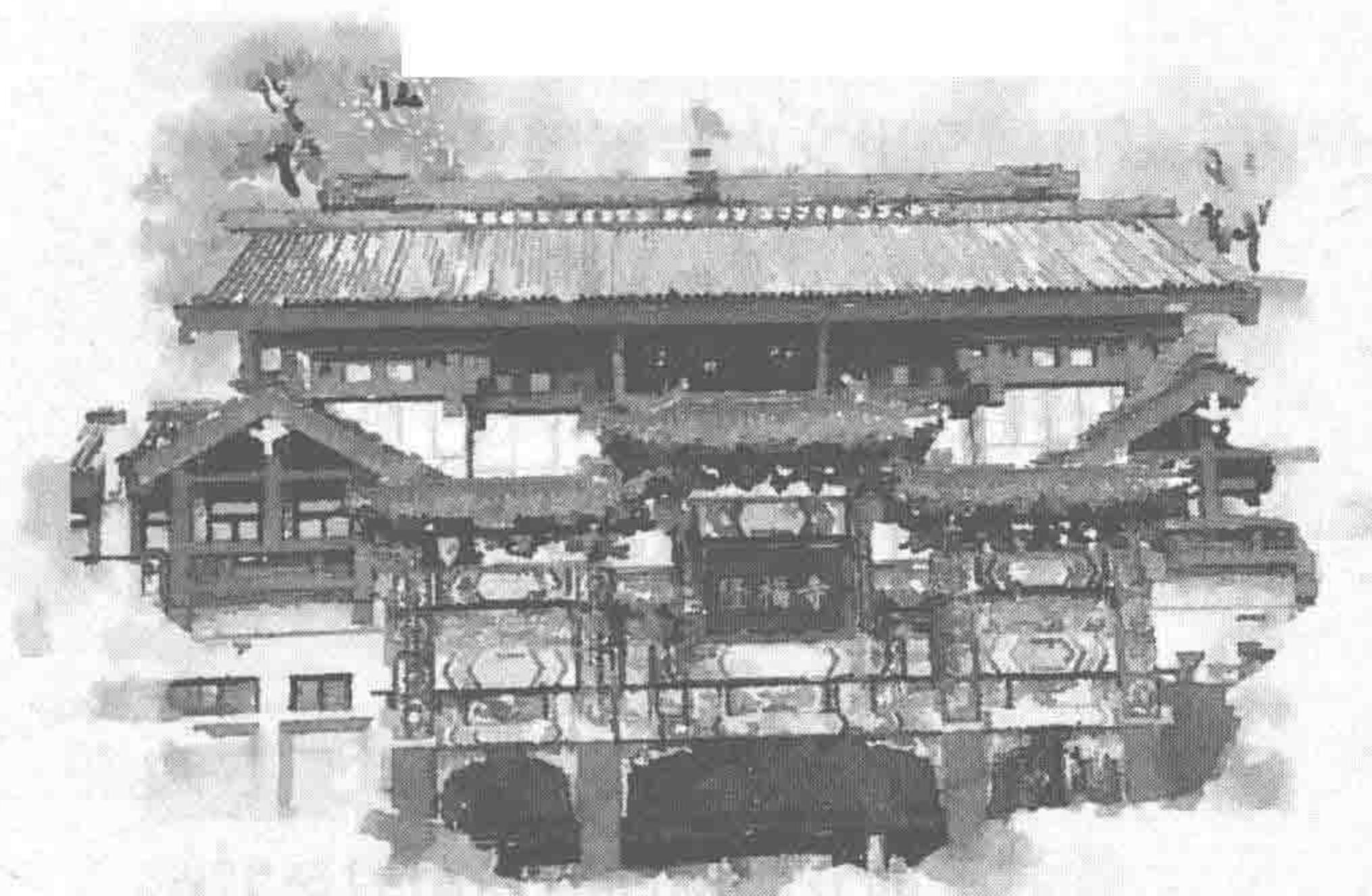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北京隆福寺 商业民俗志

卫才华 著



 商務印書館
創于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志/卫才华著.—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8

ISBN 978 - 7 - 100 - 15810 - 7

I.①北… II.①卫… III.①商业—风俗习惯史—
北京—清代—民国 IV.①K89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329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志

卫才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810 - 7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1/2

定价:69.00 元

本书是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民国时期的北京寺庙与商业：以隆福寺为例》
结项成果





目录

绪 论……1

第一章

北京城市史与隆福寺的文化空间和社会网络

第一节 隆福寺的历史文化空间和社会网络……55

第二节 皇家寺庙、隆福寺庙会与历史街区……76

第三节 朝鲜使者日记中的隆福寺中外交流……95

第二章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隆福寺商业民俗

第一节 清代档案和史料中的隆福寺街区社会……114

第二节 从民国档案看隆福寺寺庙与商业生活……147

第三节 民国文史资料中的隆福寺商业……183

第四节 隆福寺商业特征与商户个案调查……206

第三章

隆福寺商业民俗的现代传承

第一节 1950～1976年隆福寺东四人民市场商业……234

第二节 隆福寺商业文化遗产与民俗传承……249

第三节 北京商业类型与隆福寺早市……257

结语……277

参考文献……279

附录……303

附录一 隆福寺田野调查范围示意图……303

附录二 隆福寺人民市场人员访谈（样本）……305

附录三 隆福寺文献史料（部分）……309

附录四 北京档案馆隆福寺档案目录一览表……321

附录五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隆福寺档案……339

附录六 隆福寺田野调查照片……347

后记……351



绪 论

北京隆福寺在明代被称为“大隆福寺”，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25），清雍正三年重修。^① 隆福寺在明代是京城唯一的番（喇嘛）、禅（和尚）同驻的寺院，清代则成为完全的喇嘛庙。隆福寺坐落在东四北大街西，曾是皇家香火院之一，民国时期是京师著名的大庙会，为庙市之冠。因坐落在东城与护国寺相对，俗称“东庙”，其寺庙历史近五百年，1976年隆福寺庙宇建筑被拆完，后来在其原址上修建了隆福大厦。隆福寺街因隆福寺而得名，20世纪60年代改称“人民市场街”，后恢复原名，旧时指隆福寺庙前东西长街，现在主要指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美术馆东街的区域，现在隆福寺主要指景山街道办隆福寺社区。

^① “大隆福寺，恭仁康定景皇帝立也。”[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湖北图书馆藏明崇祯八年金陵弘道堂初刊本，孙小力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9～70页。

记载隆福寺的历史文献和现代文史资料很多，内容主要集中在回忆隆福寺庙会、隆福寺小吃、隆福寺书店、花店等方面。^① 明清至民国，北京地方史志和文人笔记中记载隆福寺的信息非常丰富，大多有关北京古迹、庙会甚至书市的记载都会提及隆福寺。其中记载隆福寺的官修地方志主要有：清代的《日下旧闻考》^②《宸垣识略》^③ 和《光绪顺天府志》^④ 等，特别是《日下旧闻考》对隆福寺记载比较全面、详细，后世官修方志和人文记录经常引用此书。其他笔记文献史料也记载了隆福寺的相关历史，如明代刘侗、于奕

① 徐威《隆福寺街觅古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41～47页。黄玉竹《隆福寺大街谈往》，《北京档案》2000年第2期，第48～49页。赵迅《隆福寺》，《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2004年，第324～325页。其他回忆文章如：刘心武《隆福寺的回忆》，《燕都》1986年第2期。靳麟、傅耕野、刘恩禄《隆福寺》，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第89～102页。翁偶虹《逛隆福寺庙会》，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第103～122页。刘恩禄《从东单大地到东四人民市场》，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第123～138页。李大鹏《隆福大厦的由来》，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139～140页。温开国《灶温饭馆的兴衰》，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第141～149页。黑德亮《白魁的五香烧羊肉》，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第150～158页。葛鸿年、张金阜、孙印堂、邵仲英《隆福寺街的旧书业》，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第159～166页。李彪、靳麟、李大鹏《隆福寺街的花店》，载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88年，第167～169页。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清乾隆五十三年内务府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3年。

③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清乾隆戊申刻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3年。

④ [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清光绪十五年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7年。

正《帝京景物略》^①，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②，民国陈宗藩《燕都丛考》^③，民国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等。^④这类文献表达的是文人、官员等个人对隆福寺的记忆，充满生活细节，能够看出隆福寺微观的市井人生，如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关于“隆福寺”的记录，所载信息和明史吻合。北京隆福寺曾是著名皇家寺院，在宗教、政治、文化上特点突出，在商业活动中也很活跃。隆福寺这类皇家寺庙也是城市历史街区的中心，但是它在城市社会的发展，是寺庙通过商业形式与居民、政治、宗教、文化的利益结盟来实现的。

从目前已有文献资料看，由于隆福寺的长期存在，放大了庙会的商业功能，使庙会商业具有宗教朝圣和民俗体验的双重意义。从隆福寺商业角度看，隆福寺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将神圣性和公正隐藏于繁盛之中，僧侣、官员和平民互有商业往来，商业消费成为认同隆福寺之福运象征的一部分。从隆福寺的历史地理位置看，它与北京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布的格局有关。商人社会地位的竞争，以及与管理者的紧张关系，恰恰是因他们和皇室寺庙的结合代表着一种宗教意义的社会平等，而变成合乎政府理想的社会结构。近代北京城市管理的“市”与皇城社会有区别。清代中期以后，外埠移民大批涌入北京，北京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市民阶层扩大，城市消费民俗需求突出，这也给隆福寺的商业民俗变化带来了契机。

① [明]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湖北图书馆藏明崇祯八年金陵弘道堂初刊本，孙小力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9～70页。

② [明] 陆容《菽园杂记》，清嘉庆十五年墨海金壶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60页。

③ 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1年。

④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本，1982年。

一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一) 选题的学术价值

第一，国际学界曾对我国的敦煌宝卷与寺庙僧道的生活进行过研究，研究僧商关系与观念，季羡林先生也曾提出“商人与宗教”的重要命题，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对北京皇家寺庙中僧、商和市民关系进行研究的还不多见。这里尝试通过隆福寺个案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做一些补充。民俗学对乡村庙会商市考察较多，对城市寺庙僧商关系研究较少，更没有围绕寺庙产生的不同商业民俗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过。对隆福寺商业民俗的研究发现，在寺庙世俗化过程中，共享商业民俗是商人与宗教精神的内在联系，也是现代北京寺庙街区经济发展的民俗动力。在此基础上，寺庙宗教神圣性隐匿于活跃的商业民俗之中，既保持了寺庙的经济功能，又维护了寺庙的宗教活力。

第二，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作为典型个案，透过它可以深入探讨城市寺庙商业与市民生活的关系，乃至中外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扩展民俗学的商业民俗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隆福寺商业民俗综合了众多商业领域，包括书市、餐馆、茶馆、珠宝古玩等，表现出公共活动和商业民俗共享交融的特点。比如隆福寺茶馆，是民国时期北京市民演说的重要地点，对隆福寺公共空间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发展出了城市独特的消费娱乐民俗。

第三，适当比较和观察隆福寺商业民俗变迁，对隆福寺庙会商业史和现代社区商业民俗进行比较，分析隆福寺商业民俗的现代传承，讨论隆福寺历史街区的管理模式可以补充民俗学对现代城市历史街区民俗传承的探讨。

(二) 选题的社会现实意义

第一，尝试在北京城市寺庙历史街区社会中，观察其商业民俗的运作特征，探究商业民俗的内在机制和现代功能，指出在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民间商业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第二，揭示皇家寺庙、历史景观和商业文化遗产的关系，实现历史街区文化保护的双重目标。在近代北京城社会巨变中，围绕隆福寺形成了丰富的历史街区景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历史传统进一步和商业文化遗产相结合，对现代隆福寺社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第三，从民俗学角度看，对城市商业民俗做细化研究，可以丰富对北京城市社会史的讨论。隆福寺这样的皇家寺院，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表现出皇寺商业、庙会商业、市民商业等不同商业类型。在此基础上，隆福寺商业民俗志的研究，深化了对北京城市商业发展的认识。

第四，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志研究，为北京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研究个案，将民俗资料分析和文化空间保护实践结合起来探讨，是对建立现代商业民俗传承和民俗遗产保护模式的尝试。

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志，主要运用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僧商关系和市民社会视角，审视隆福寺皇家寺庙商业民俗变迁，围绕这所寺庙所产生的寺庙商业、庙会商业和社区日常商业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研究。本书主要使用了北京地方史志、笔记杂纂、历史档案、工商税务档案和现代隆福寺文史资料等，也使用了作者的田野调查资料，对清代民国时期隆福寺的商业民俗形态进行研究和阐释。另一方面，对隆福寺拆除后，区政府、社区管理部门和市民在重建隆福寺大厦和隆福寺商场中

所表现出的记忆重建，所呈现出的商业民俗想象，也适当予以考察和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揭示隆福寺商业民俗遗产的内涵和现代传承启示，并为深入研究北京城市商业民俗打下基础。本项研究有助于拓展民俗学的商业民俗研究领域，对北京历史城市著名商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也有现实社会意义。

二 相关研究的学术史

20世纪90年代商业研究者提出应该重视对商业文化、商业习俗的研究，主要关注对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习俗惯制的研究，在商品包装、商业组织制度、商业观念文化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观点和方法。这些研究倾向于对商业民俗事象分类，较少关注市民、商人的日常生活资料，缺少将商业与城市民俗社会的内在互构关系、社会网络等结构性运行机制联系起来考虑。^①以往的商业民俗研究，也很少从民俗理论的角度去分析传统集市商业习俗的功能，以及它在现代商品交易中的现实意义。对商业习俗的研究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事象描述和商业资料汇编的基础上，较少挖掘商业民俗传承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这里主要借鉴“经济民俗”研究文化认同、内部群体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框架，探究隆福寺商业民俗在北京城市经济中的功能与意义。

^① 王锐《商业民俗学及其研究意义》(一),《商业文化》1997年第3期,第54~56页。《商业民俗学及其研究意义》(二),《商业文化》1997年第4期,第49~51页。《中国商俗文化刍议》(I),《天津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64~70页。《中国商俗文化刍议》(II),《天津商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第62~68页。

(一) 北京城市寺庙功能和管理的综合研究

近年来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如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都对北京寺庙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加深了对北京地方史、宗教史和城市史的理解，这对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研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一，从城市史研究来看，历史学借鉴西方城市史研究的方法对北京城市展开研究，从对制度史、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转向对城市社会历史空间的综合研究。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从历史上的城市、空间的城市、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三个角度阐释了晚清中国城市的研究成果。他在第三编导言“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中，总结出清代中国城市社会中城市生态、客居与城市会社、城市会社与市政管理三个框架。他认为：

清代北京的城市生态模式特点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商业活动中心，一个官僚士大夫活动中心。商业区以店屋为主（在大城市通常是二层楼房），其中商店的售货房与手工业作坊的作坊同时也兼作伙计（以男性为主）的餐室与卧室。住区都很拥挤，因为地价高昂，商业通常总想降低非必要的一般企业管理费，客居者也尽量节约他们的进款……在“中心”商业区，会馆及其他由商人领导的互助会社，效力到达顶点，贫困的失业者不是由慈善机关妥为照顾，以“公费”遣送还乡，就是不许寄寓该区……城市缙绅的宅第常结集在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官署附近。在两个核心之间的地区，则是绅商杂处，店宅交错，但就每人平均财富方面而言，却比商业区本身要均匀些，

在这个地区，有时候可以找到一些庙宇及其他文人合办的公共机构。^①

施坚雅关于城市社会史的研究认为，清代北京城市形成了两种中心区，一种是商业活动中心，一种是官僚贵族活动中心。通过隆福寺个案可以看出，寺庙是清代北京城市活动中心区之一，不但因为它作为寺庙的文化特征，而且因为寺庙是通过庙会商业民俗形式，融入北京城市中心社会的。清代北京城市可能有一种寺庙与商业民俗共享的社会类型，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和官僚活动两个核心。

该文从时空意义解决了商业和空间、环境剥离叙述的尴尬，更多地从市场结构、街坊组织、行政变迁等方面试图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模型，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但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是建立在所有“理性”认知基础上的，它有其独特的文化逻辑背景，所以产生的民俗意义与智慧的生存之道，也远非众多模型可以解释，需要以具体化、生活化的特殊个案来揭示民俗生活网存在的普遍意义。不过西方城市社会市史所体现的“计量”史学的精致，对城市商业民俗研究启发很大。

李孝聪《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从历史上城市管理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旧北京城区内的寺庙的修建、结构、类别、功能、变迁等因素做出解释。^②这项研究使用了大量的地图，描绘出寺庙在北京城区内的分布特征。他指出：

① [美]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34～637页。

② 李孝聪《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宗教史专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66页。

北京民间寺庙的选址标准是多元的，有一些体现了寺庙的社会功能，有一些现体了其宗教功能，有一些是上层官员的旧宅等。寺庙分布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商业与政治核心的交界处，这两种核心区域内也有寺庙的分布。^①

李孝聪的研究启发我们在宗教寺庙之间的横向关系的研究中，注意隆福寺商业民俗的特点。同时，对我们从空间意义分析隆福寺在整个北京城的社会空间布局，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历史地理学者从空间分布考察寺庙的社会意义，较少分析街区内在社会活动的关系。就隆福寺个案来讲，物质和人文空间环境，只是它在北京城市社会表现出的一个方面，寺庙与商业共享的民俗传统，可能才是它得以兴盛百年的内在动因。

历史地理学也借鉴传统美学思想中诸如“意象空间”“人文景观”“生态平衡”等观点，来探讨城市意象空间，从文化传承点的空间意义论析，构建复杂的文化地理模型，但对细节研究不够，无法充分呈现内在民俗生活的肌理。不过其“历史遗产观”的传承方式，能够将人文内涵吸取到物质民俗的研究中去，对城市物质民俗研究颇有启发。

第二，一般认为，明清的北京城是政治中心，由于人口流动性强，处于皇权的直接控制之下，难以形成民众共享的福利组织和公共活动空间。事实上北京旧城社会中在寺庙周围已经形成了宗教资源、民俗资源、市场资源共享的历史街区社会。在国家和市民生活之间，城市寺庙发挥着公共空间的部分功能。尤其是皇家

^① 李孝聪《城市职能建筑分布》，选自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0～213页。

敕封的大寺庙，具备这种城市社会缓冲、人口流动和信息交换的功能。

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通过对北京旧城寺庙的研究发现，宗教行事结构比信仰的教派的定义更重要。他认为围绕庙宇，北京城市社会内部存在着某种“祭祀结构”。

围绕庙宇，北京城市社会内部存在着某种“祭祀结构”，这些结构使人们获得个人隶属于某个空间的意识，个人投入其中，不仅是焚香修行，还参与诸如慈善、公共卫生、教育或文化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城市中，祭拜团体与街区叠合，可以说存在着某种“住地公民品质”，其前提是邻近距离和共同祭祀。^①

他认为祭祀团体和居住关系重合，在北京城市社会围绕各街区寺庙形成了组织化特征的生活共同体。其实，从隆福寺个案来看，寺庙本身并不能完全组织生活共同体，祭祀和居住关系并不对等，相反商户要比住户更加活跃，祭祀信仰也不明显，隆福寺是通过寺庙与商业结盟的民俗传统，来维持一个特殊寺庙街区的历史传统和经济活力的。

韩书瑞（Susan Naquin）是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北京寺庙与社会结构的。在众多的社会领域和公共场所中，选择寺庙作为研究

① 转引自〔法〕吕敏（Marianne Bujard）《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的二排六段：初步调研北京钟楼一带的庙宇》，《东亚民俗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1.1～2），第94～112页。另参见〔法〕施舟人（Kristofer M.Schipper）《旧北京的宗教行事结构》，《中国道教》1992年第4期。

对象，是因为寺庙是 1949 年前的中国允许人们可以进行集会的少数场所，因此寺庙变成了社区建筑的中心和身份认同的焦点，寺庙对北京的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有着相当大的影响。^① 她指出北京寺庙与城市社会生活研究的三大主旨：

一是希望透过北京来看宗教的动力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一是挑战过去认为明清是连续的假说；一是强调中国在现代早期所出现的新发展，特别是在 19 世纪发展出来的新的机制和动员习惯，延续与影响到 20 世纪的现代……她指出过去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缺点，如过去宗教史的研究太偏重教派、教义与思想，而人类学的共同体理论则无分城乡，所以作者想另辟蹊径，从城市寺庙来看共同体与地域认同的形成。^②

她强调寺庙在北京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与其他的公共场所、娱乐场所和商业场所不同，庙宇是北京城内唯一可能成为长期性公共领域的空间，因而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最好入口。在《18 世纪中国社会》一书中，她指出：

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社會分布特点是形成了上层、商人和

^① [美] 韩书瑞 (Susan Naquin)《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 2000 年, 第 xxxi 页。

^② [美] 韩书瑞 (Susan Naquin)《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 2000 年。也可参见巫仁恕《评韩书瑞 (Susan Naquin) 教授〈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台北：《明代研究通讯》2003 年第 6 期，第 122 页。